

王韬撰文《遐迩贯珍》考

——兼议王韬报业活动之起点

萧永宏

内容提要 1854年7、8月间《遐迩贯珍》刊载的《瀛海笔记》和《瀛海再笔》，是目前所见王韬发表最早的两篇报刊文章。但是，由于同一时期王韬近代报刊意识缺乏等一些具体原因，王韬为《遐迩贯珍》撰稿之举，尚不能成为认定他从事报业活动起点之标志。该起点从1870年代初王韬兼任《香港近事编录》编辑算起较为合适。更明确之标志，当非王韬于1874年受聘出任《循环日报》“正主笔”一事莫属。

关键词 王韬 《遐迩贯珍》 《瀛海笔记》 报刊意识

萧永宏，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210097

王韬是中国近代民族报业发轫时期的关键人物。以往的各类新闻史论著，在叙述王韬接触近代报刊的经历时，一般只追溯到1857年王韬在《六合丛谈》刊文等事实。然而，现有资料表明，早在1854年，王韬已有文章在香港出版的《遐迩贯珍》刊示。当年7、8两月^[1]，《遐迩贯珍》先后分两期连载由王韬代笔但未署名的《瀛海笔记》和《瀛海再笔》^[2]。《瀛海笔记》和《瀛海再笔》是目前所见王韬公诸报端最早的文章。此文的发表，也是王韬较早接触近代报刊的有力见证。

《遐迩贯珍》刊载《瀛海笔记》和《瀛海再笔》时，该文并未署名，但细检史料，不难证实，文章作者确系王韬。王韬《瀛壖日志》载有他为应雨耕代笔《瀛海笔记》一事。“七月初旬……是月中，应雨耕来，自言曾至英国览海外诸胜。余即书其所道，作《瀛海笔记》一册。”^[3]咸丰三年六月的《沪城见闻录》

[1]《遐迩贯珍》出版时间基本采用西历，但也照顾了中国人的习惯。比如，该刊每月1号出版，所以它在出版日期上除注明西历年月的同时，又用“朔日”、“朔旦”等阴历术语。这种情况，在所有近代中文报刊中都比较特殊。因为此前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用阴历，《遐迩贯珍》之后的《六合丛谈》也都用阴历，而很少有这种中西历合用的情况。

[2]《遐迩贯珍》影印文本，1854年第7号、8号。〔日〕松浦章、〔日〕内田庆市、沈国威：《〈遐迩贯珍〉的研究》，日本吹田：日本关西大学出版部2004年版，以下所引《遐迩贯珍》均据此版本。另，2005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又翻译出版了该日文版影印本。见〔日〕松浦章、〔日〕内田庆市、沈国威：《遐迩贯珍》（附解题索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

[3]《瀛壖日志》为王韬咸丰三年三月十一日至咸丰四年正月初一日日记（1853年4月18日—1854年1月29日）。现藏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美国学者柯文在其《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一书中最早使用并

也述及：“雨畊言海外风景及山川草木，述英国伦敦之事甚悉，因作《瀛海笔记》一卷。”^[1]王韬的另一部著作《瓮牖余谈》同样提到此事。书中记云：“……咸丰初年，有燕人应雨耕从今驻京威公使往，在我国中阅历殆遍。既归，述其经历。余为之作《瀛海笔记》，记载颇详。”^[2]

应雨耕是王韬在沪期间结识的好友之一。王韬在其日记中多次对他作过介绍。咸丰八年八月二十四日记曰：“雨耕名龙田，祖籍浙江兰溪人，固武世家。其父谒选至京，遂家焉。后为广东副将，又徙于粤。为人慷慨，以胆略自负，待友诚至悱恻，意气激昂，亦奇男子也。”^[3]咸丰三年六月的《沪城见闻录》又介绍说：“应雨耕，名龙田，直隶人，籍本浙江金华府，六月初旬从海外来，持其居停威君札，谒见麦公，谓将入教，服膺耶稣。嗣是每日来读圣书，正斋亦来合并。麦公为之讲解，娓娓不倦。”^[4]

《遐迩贯珍》刊出《瀛海笔记》时，并未提到应雨耕的名字，只一般性交待说：“癸丑六月，友人从英来，言客春偕居停主人回英，居其都者七阅月，目亲身观，凡英土民物之繁庶，建造之高宏，与夫政治之明良，制度之详佃（疑为备，原文如此，萧按），有可述者，皆笔而记之……”^[5]。然而，比照前述《瀛墟日志》、《沪城见闻录》和《瓮牖余谈》等记载，不难发现，此处隐去的“友人”正是应雨耕。因为，文中所言癸丑六月，即是咸丰三年六月。此与咸丰三年《沪城见闻录》所记“六月初旬从海外来”的时间完全一致。而“客春偕居停主人回英”一语，也和《瓮牖余谈》中“有燕人应雨耕从今驻京威公使往”的提法以及《沪城见闻录》中“持其居停威君札”的记述基本相同。由此可知，所谓的居停主人，正是英国驻京公使威妥玛。另外，此处的“从英来”和《沪城见闻录》的“从海外来”基本一致，的文章 enzhangi-anchuqi “直隶人”和《瓮牖余谈》说到的燕人是一回事，且完全雷同于王韬《沪城见闻录》的记载。再者，一个“友”字，也揭示了代笔人王韬和被代笔人应雨耕的关系。如再联系到《遐迩贯珍》所刊《瀛海笔记》的篇名和王韬在他处多次提到的自己为应氏代笔的文章名称同为《瀛海笔记》等现象，即可确认，《遐迩贯珍》所刊的《瀛海笔记》和《瀛海再笔》与王韬《沪城见闻录》和《瓮牖余谈》等著述中一再提到的《瀛海笔记》是同一篇文章。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应雨耕归国的时间，王韬虽多次提到是咸丰三年“六月初旬”，但王韬《瀛墟日志》也有“七月初旬”的提法。其实，二者并无矛盾。仔细辨认，“六月初旬”确系应雨耕自英国回来的时间，而日记中的“七月初旬……是月中，应雨耕来”的记载，只是应雨耕前来谒见王韬的时间，并非指应雨耕归国的时间。如此说来，王韬与应雨耕见面，是在应雨耕赴英归来约一个月之后，而且，正是这次见面，才导致了《瀛海笔记》一文的诞生。此后，大约又过了一年，这篇文章才在《遐迩贯珍》上分两期连续刊出。

二

《遐迩贯珍》是鸦片战争后由马六甲迁至香港的英国伦敦布道会下属的马礼逊教育会出版、香港英华书院印刷的一份中文刊物，也是香港最早出版的中文刊物和近代中国最早使用铅印的中文报

录有这部分日记。此处引自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雷颐、罗检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页。以下均据此版本。

[1]陈正青整理：《王韬未刊日记、杂录》，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十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28页。此处的“雨畊”，即雨耕。此从原文。

[2]王韬：《星使往英》，《瀛墟杂志 瓮牖余谈》卷3，陈戍国点校，〔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1988年版，第78页。以下均据此版本。

[3]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6页。

[4]《瀛墟日志》咸丰三年六月，引自熊月之：《开埠初期上海文人生活写照——介绍台湾未刊王韬日记》，上海中山学社：《近代中国》第十二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76页。

[5]《遐迩贯珍》影印文本，1854年第7号，第635页。

刊。1853年8月1日创刊,1856年5月停刊^[1]。前后共出刊33册^[2]。由上海墨海书馆的首任监督麦都思、麦都思的女婿奚礼尔以及香港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先后负责,实际事务由毕业于香港马礼逊学堂、担任伦敦传道会教会印刷所主管的黄胜经理^[3]。

王韬在《遐迩贯珍》刊文疑与他的居停主人麦都思从中推荐有关。王韬自1849年佣书墨海书馆后,一直在麦都思手下从事中文翻译的编校工作,主仆契合。王韬称麦都思为其“海外一知己”^[4]。作为《遐迩贯珍》的主要创办人和负责人,麦都思推荐王韬文章见刊该刊,当在情理之中。本来,应雨耕随驻英公使威妥玛赴英期间,对其游历观察所得,已有著录。据王韬在《瀛海笔记》所言,应雨耕在英期间“据所见而录之”,所有记述多达“数十则”^[5]。至于应雨耕归来后该游英笔记又经王韬代笔,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王、应二人交情笃厚,而应雨耕本人文化程度不高。王韬日记中多处记有王、应二人的交往,很多时候两人几无日不见。在致应雨耕的一封信中王韬还袒露心扉说:“瀚来海上,以文字交者,固不乏人;以意气交者,阁下一人耳”^[6]。其实,王韬钦敬应雨耕的只是其“意气”,而对其疏于文墨却不无怨言。如咸丰十年三月二十四日《日记》所记:“既夕,独往应雨耕寓斋,数语即别。雨耕胸中故无只字,性情乖谬异常,终日唯痴癖于烟云中而已,何足与谈。”^[7]应雨耕胸无点墨,又嗜烟如命,舞文弄墨,显非其所长。因此,应氏游英笔记虽条目众多,但在叙述的条理性和文气的畅达等方面应多有欠缺。在此前提下,借助王韬之力,由王韬“稍为修饰叙述”、“条次而录存”^[8],自可补此不足。另一方面,从王韬来说,自从“橐笔沪上”以后,王韬非常留心西方的“象纬舆图之学”^[9],对西方的风土人情、历史掌故及国人的海外见闻等勤于搜访,且一直兴致有加。此番应雨耕归国带回的居英见闻录,不仅可以丰富知识,开阔眼界,而且这些亲历记述还可以弥补《海国图志》及《瀛寰志略》“二编之未备”,供“世之具三长而操著作权者之博采”^[10],有益于世。因此,王韬非常乐意为应雨耕之游记代笔。

王韬虽然在《遐迩贯珍》创办的第二年于该刊发表稿件,但王韬接触《遐迩贯珍》应比这更早。因为主持墨海书馆的传教士麦都思是《遐迩贯珍》最早的创办者和负责人。因此,墨海书馆和《遐迩贯珍》必有较密切的联系。作为一份中文刊物,王韬在佣书西人之余,较早阅读《遐迩贯珍》应无疑义。譬如,1855年,与王韬同村、谋生于松江的孙惕庵曾致函王韬向其索要《遐迩贯珍》^[11]。另据《郭嵩焘日记》记载,1856年3月,郭嵩焘造访墨海书馆时,麦都思仍“外赠《遐迩贯珍》数部”^[12]于郭,而同一时期

[1]关于《遐迩贯珍》的研究,目前所知的最早研究成果当推新加坡学者卓南生1974年在日本立教大学《应用社会学研究》刊布的《〈遐迩贯珍〉(1853-1856)——对香港最早的中文月刊报纸的探讨》一文,该文后收入卓氏《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增订版,第5章。

[2]《遐迩贯珍》为月刊,自1853年8月创刊至1866年5月停刊,实际月数为34月,故应出34册,但由于1854年3月停1期,当年4月所出该刊合第3、4期为1期,故该刊共出版33册。

[3]黄胜担任伦敦传道会印刷所主管一事,见苏精:《黄宽与黄胜:容闳的两名同学》,《传记文学》(台北),第46卷,第2期,第73页。黄胜主持《遐迩贯珍》实际事务一说,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页。该著指出:“举凡中文撰稿、英文翻译、报馆总务,均由黄胜经理”。确切出处待考。

[4][6]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日记》,咸丰八年八月二十四日,第17页,第16页。

[5][8][10]《遐迩贯珍》影印文本,1854年第7号。〔日〕松浦章、〔日〕内田庆市、沈国威:《〈遐迩贯珍〉的研究》,日本秋田:日本关西大学出版部2004年版,第635页,第635页,第635页。

[7]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日记》,咸丰十年三月二十四日,第157页。

[9]王韬:《弢园老民自传》,《弢园文录外编》卷11,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69页。

[11]王韬:《弢园尺牍》卷2,《与孙惕庵茂才》,清光绪二年香港天南通窟铅印本,第20页。以下所引《弢园尺牍》1-8卷,均据此版本。

[12]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1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页。

的赵烈文也将其收藏的全套《遐迩贯珍》借给吴嘉善等官员阅读^[1]。这从侧面也证明,比起郭嵩焘和赵烈文来,王韬在当时更有条件和机会较早接触《遐迩贯珍》,同时还说明,在1850年代中期,至少在一小部分浸染西学的知识分子中间,《遐迩贯珍》已受到较多关注。

以往学术界在提到王韬接触近代报刊的经历时,一般只注意到王韬1857年9月刊于《六合丛谈》中的《反用强说》及在此前后刊于该刊的由王韬与传教士伟烈亚力合译的《重学浅说》、《华英通商事略》、《西国天学源流》等文。现在,明确早于此前,王韬已有文章在香港的《遐迩贯珍》刊出,其意义当然非同小可。因为,对于作为中国近代报业发轫时期关键人物的王韬来说,其接触近代报刊的经历至少又可以提前整整三年。

三

以往学界因不明了王韬为《遐迩贯珍》撰稿等史实,故常将1857年王韬在《六合丛谈》刊文一事误认为王韬从事报刊活动之始^[2]。现在,确认早在1854年王韬已为《遐迩贯珍》撰稿,是否又可以将王韬报业活动的起点再提前三年呢?其实未必。因为确定王韬报业活动的起点,并非是一个王韬何时为哪种报刊写稿这样一个简单的时间认定。而且,单单一次写稿行为毕竟还不完全等同于报业活动本身。事实上,无论是王韬先期为《遐迩贯珍》撰稿,还是之后再在《六合丛谈》刊文,这都是一般普通受众较为偶然的“投稿”行为,充其量只是王韬早年接触近代报刊的开端,很难说这就是王韬从事报业活动的起点。虽然,目前尚无确凿资料证实《瀛海笔记》和《瀛海再笔》就是一般的“投稿”,但据王韬《蘅华馆日记》记载,1857年王韬在《六合丛谈》见刊的《反用强说》确是实实在在的投稿。日记云:“春间……云间韩菴卿作《用强说》,意在抑英国之强也。长且无聊,戏反其意作《反用强说》一篇寄往墨海,俾刊入《六合丛谈》中。”^[3]王韬不同于一般受众之处,只是他佐西人校译基督教经书之余,与麦都思、伟烈亚力等这些报刊主编非常熟悉。出于工作上的关系,他可能比一般人有更多接触《遐迩贯珍》的机会。而且,只要他有较为合适的稿件,也比一般人相对容易发表。另从王韬当时的工作性质来看,它只是麦都思手下的一名中文译员,尚不是《遐迩贯珍》的“秉笔者”,协助传教士译经始终是其主业。译书之余,偶尔有一两篇稿件在居停主人麦都思主编的报刊上刊出,也只是日常主业之外的一点补充,是名副其实的“副业”。在此前提下,单纯的只依据王韬的一两次较偶然的“投稿”行为,就断言这是王韬报业活动的开端,显然有些牵强。

王韬上述这些零星为报刊撰稿的行为不构成王韬报业活动起点的另一重要原因还在于,至少直到1862年遁迹香港之前,王韬的近代报刊意识相当淡薄。两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一是1855年,与王韬同村的秀才孙惕庵致函王韬向其索要《遐迩贯珍》,但王韬却在回信中一古脑儿将《遐迩贯珍》及其“秉笔者”们贬斥一番:“承索《遐迩贯珍》,但此糊窗覆甌之物亦复何用?徒供喷饭耳!此邦人士,躐等而进,才知字义,已矜著述,秉笔者半属落魄商贾,恒订未学,欲求其通,是亦难矣!”^[4]王韬这番近乎痛骂的话,有对因生活所迫而“托迹侏离,获罪名教”^[5]的一腔愤懑和无奈,也有对《遐迩贯珍》的轻

[1]赵烈文在日记中记云:“余向与弢甫采集夷事《遐迩贯珍》全部。弢甫屡得屡散,余数年来仅而得全,为吴子登庶常索观不还,乃以转借邓随帆观察。数日前,吴子登见访,忽言观察已下世,此书遂尔零落,可惜,可惜!此书后半月,其书归还。”见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1册,〔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2013年版,第39页。

[2]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其它类似说法的相关著述很多,兹不一一列举。

[3]王韬:《蘅华馆日记》,稿本,不分卷。上海图书馆古籍部藏。此处转引自周振鹤:《六合丛谈综论》,《中华文史论丛》第六十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页。

[4]王韬:《弢园尺牍》卷2,《与孙惕庵茂才》,清光绪二年香港天南通富铅印本,第20页。

[5]王韬:《弢园尺牍》卷3,《与周弢甫比部》,第16页。另,该信函全文王韬又录入其《日记》,见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日记》,咸丰八年十二月九日,第61页。

蔑和不屑。但相较而言,后者的表达更直接,也更充分,几毫无掩饰。二是1859年5月,王韬及其好友蒋敦复与传教士伟烈亚力就中西政治的优劣异同,有过一场讨论。王韬和蒋敦复认为,西方政治大谬不然者有三:“男女并嗣”、“君民同治”和“政教一体”。伟烈亚力则以泰西政治“与民共治”和“与民共利”、“下悦而上行”等诸多优点为例,批评清廷“政事雍于上闻,国家有所兴作,小民不得与知”等弊政,建议清廷“仿行新闻月报”^[1]。而王韬对此却百般辩解。他以“泰西列国,地小民聚,一日可以遍告”为由,断言刊行“新闻月报”之法在中国并不可行^[2]。

与上述两例相映成趣,同一时期的王韬甚至还不完全把《六合丛谈》认作近代报刊,而仍把它视作传统意义上的一般书籍。如《王韬日记》咸丰九年四月七日(1859年5月9日)所记:“予谓近所著《六合丛谈》中有《泰西通商事略》一卷,载其贸易粤东颠末甚详……”^[3],又如以伟烈亚力名义发表的《六合丛谈》创刊号《小引》中也说:“今予著《六合丛谈》一书,亦欲通中外之情,载远近之事,尽古今之变,见闻所逮,命笔志之,罔拘成例,务使苍穹之大,若在指掌,瀛海之遥,如同衽席……”^[4]这些表述,几乎都在《六合丛谈》前用了“著”字。固然,创办《六合丛谈》的伟烈亚力把本属近代报刊的《六合丛谈》当作中国传统的书籍加以发行和宣传,实有迎合中国传统士人的习惯和争取更多中国读者的用心。但是,对于略知西学一二的王韬来说,对此却未能明辨,反而将《六合丛谈》以书籍相称,这说明,有关“近代报刊”的理念,还远未扎根于王韬的头脑之中。

近代报刊意识的淡薄,制约了王韬自主能动的报刊活动的开展。加之当时中国社会较为落后的诸多条件所限,国人的报刊意识和自主报业活动都无从起步。因此,截至1862年遁迹香港之前,王韬没有明确的自主性办报活动出现。1870年,王韬从欧洲归来后,开始积极为《香港近事编录》、《香港中外新报》、《中外新闻七日报》、《香港华字日报》等报刊撰稿,并于1874年参与创办《循环日报》、受聘出任该报“正主笔”^[5],至此,王韬终于成为香港华文报坛名重一时的报人。由此可见,王韬真正投身报业活动的起点应在他1862年潜往香港之后,且不迟于1874年《循环日报》的创办。目前来看,这一起点从王韬1870年代初担任《香港近事编录》的编辑算起,较为合适^[6]。而更明确的标志,当然非王韬受聘出任《循环日报》“正主笔”一事莫属。

[责任编辑:肖波]

[1]伟烈亚力云:“泰西之政,下悦而上行,不敢以一人揽其权,而乾纲仍弗替焉。商足而国富,先欲与万民用其利,而耐用无不裕焉。故有事则归议院,而无蒙蔽之虞;不足则筹国债,而无捐输之弊。”见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日记》,咸丰九年四月四日,第113页。

[2]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日记》,咸丰九年四月四日,第113页。以此类推,王韬还以同样的思路和相应的理由对建铁路、用机器、开议院等西方“善政”逐一加以否定。

[3]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日记》,咸丰九年四月七日,第114页。

[4]伟烈亚力:《六合丛谈小引》,《六合丛谈》第1号,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增订版收有《六合丛谈小引》影印本全文,见卓著:附录Ⅱ,第229页。因为“小引”中“苍穹之大,若在指掌,瀛海之遥,如同衽席”,类似的话,王韬笔下经常出现,加之当时王韬担任协助传教士从事汉文翻译删削的角色,因此,不排除,此“小引”曾经王韬润色修改过。

[5]有关王韬受聘出任《循环日报》“正主笔”一事,笔者另有论述。详见萧永宏《中华印务总局与〈循环日报〉的创办——〈循环日报〉创办者问题辨证》,〔上海〕《新闻大学》,2007年夏季号,第43页。

[6]美籍学者白瑞华提到“王韬佐理雅各译书的同时,还兼任《近事编录》的编辑工作”。见Roswell S. Britton, *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Limited, 1933, p.43.另外,美国传教士范约翰(J.M.W. Farnham)1890年所提供的《中文报刊目录》,在《香港近事编录》的“主编”栏也明确注明王韬。周振鹤《新闻史上未被发现与利用的一份重要资料》一文后附有范约翰的《中文报刊目录》,见《复旦学报》1992年第1期。因该报原件已失,目前还缺乏一手资料加以确认,不过,王韬担任过《香港近事编录》的编辑工作,应无问题,时间应不迟于1872年5月。见萧永宏《〈香港近事编录〉史事探微——兼及王韬早期的报业活动》,〔北京〕《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